

# 十八世纪初期中国的人丁数量与人口数量变动研究

王 跃 生

**【提要】** 18世纪初期中国的人丁数量和人口数量究竟有多少?这在学术界歧异较大。本文首先对该时期人丁的统计方式作了考察,并校正了一些与实际不符合的人丁数字,进而对丁与户的关系以及户口比、丁口比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对18世纪初期的人丁数量和人口数量提出新的估算方式。

**【作者】** 王跃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所说的18世纪初期限定在1700~1735年这一段时间内。它是清代历史(1644~1911年)的一部分。严格来说,18世纪初期的清代只有人丁数量,而没有人口数量的记载,因而限制了人们对整个18世纪中国人口数量变动的认识。虽然一些学者对此曾作过研究,试图解决人丁与人口的关系问题,然而却有不尽完善之处。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将这一研究进行下去。这里仅就自己思考所及谈点看法。

## 1. 清代人丁与人口关系研究概况

由于清代有前后不同的两种人口统计方法,即雍正年(1723年)以前以人丁统计为主,而乾隆六年(1741年)之后则以全体人口作为统计对象,所以造成了人们认识清代人口增长状况的困难。那么,人丁与户、人丁与人口有没有可循的关系,二者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加以转换。对此不少研究者作过探讨,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清代的人丁数与人口数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具体比例为1:5,其折算方法是将《清实录》所载各年人丁数乘以5,即为该年人口数<sup>①</sup>。这种方法被不少研究者采用。如以此折算,那么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的人口数为 $20\,410\,963 \times 5 = 102\,054\,815$ 。为什么他们将比例关系选为1:5呢?因为不少人认为,当时的1丁实际代表1户<sup>②</sup>,而户均规模在中国传统社会多为5口及其上下。

另一种意见认为,清代的丁数与户数是不相等的,因而1:5的比例关系也是不能成立的。郭松义先生指出,清初的人丁数只是民丁中的当差人丁数,而不是当时全部的丁数<sup>③</sup>。通过考察,他将人丁与人口比例确定为1:4。若按此推算,1700年的人口数为81 643 852。

① 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第40页。

② 周源和:《清初人口统计析疑》,载《复旦大学学报》,1980年3期。

③ 郭松义:《清代丁口问题》,载《清史研究集》,第二辑。

第三种意见认为,清初的人丁数只是一个纳税单位,并不反映当时的实际人丁数,因而根据人丁数来推算人口数也是行不通的<sup>①</sup>。

我认为,对于清代官方统计并载入《清实录》的人丁数,既不能视之与当时户数等同,也不能将其一概否定。本文拟在这些丁数基础上,结合其它资料,对清代,主要是18世纪初期人丁数量和人口数量问题作进一步分析。

## 2 18世纪初期人丁统计的方式及人丁数字的准确性问题

18世纪初期的人丁统计是和清政府的赋税征收息息相关的。同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一样,一旦户口调查与赋役征收、摊派结合起来,官方和民众的矛盾就会产生,而人口数字的准确性便会大打折扣。清代的人丁数同样是令我们生疑的问题。

### 2.1 人丁统计的特征

18世纪初期的人丁统计方式源于清顺治五年(1648年)。清政府规定:三年一次编审天下户口(顺治十三年,改为五年编审一次),并“攒造黄册”,时称户口黄册。“每遇造册时,令人户自将本户人丁依式开写。即“民年六十岁以上者开除,十六岁以上者增注”<sup>②</sup>。由于清政府强调的是将“本户人丁依式开写”,因而黄册所载实际是指16~59岁的成年男子。但是也有特殊情况,个别地方将部分女口也包括进去。根据《康熙大清会典》(卷23,户部)所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广东人丁1 194 000丁口(内妇女515 175口),福建1 395 102丁口(盐课716 889口)。而这些女口也被汇入当年“直省人丁”总数23 417 448丁口之中。因为在总数后的单位上注明“丁口”而非“丁”,所以它说明会典的编撰者知道该数字并非纯粹的“人丁”数,而是包括一部分女口的“丁口”数。同时,用会典所载康熙二十四年丁口数与实录所载当年人丁数(20 341 738)相比,二者相差3 075 710。这表明会典数字与实录数字是有不同内涵的。至少在部分省份是这样。特别是江西、福建、广东、浙江等省有“妇女钞银”这一赋税类别。因而她们在五年编审时会被收入黄册,乃至会典之中。这就强烈表明,清政府编审户口时只将与赋税有关的人口或人丁统计进去。

而会典数与实录数在同一年度的差别,则反映了清政府从全国范围来讲,更想及时了解人丁的变化状况。不过,二者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清初,三年或五年一次的户口编审与每年一次的人丁上报分属两个不同的统计系统。即编审重在考察赋役人口数量变化,而年度上报既要观察赋役人丁的增减状况,又要借此了解人口消长水平,即把人丁数量作为人口变化的一个缩影。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诏谕就说明了这一点:“直省每岁终,各将丁徭赋籍汇报总数,观户口消长以定州县考成”<sup>③</sup>。这就是说,清政府在五年编审一次之外,还希望及时了解每年丁数的变化,进而对全国的赋役人丁有所掌握。

### 2.2 人丁数字的准确性问题

所谓人丁数字的准确度问题主要是指每年载入实录的人丁数是否将绝大多数16~59岁的成年男子包括进去。

客观上讲,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将全部人丁统计在官方册籍上是不可能的。这主要是因为官方要求与民众意愿不相符合。即政府试图获得更多的人丁来增加丁银,而百姓则设法摆

① 潘喆、陈桦:《论清代的人丁》,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4月。

②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133,户部。

③ 康熙《大清会典》卷23,户部。

脱政府的控制而瞒报、少报人丁。同时,由于清政府急于获得丁数而令地方官每年上报一次,显然,由此获得的省级单位丁数是通过各地州、县官员上报督抚后汇总所得。而州、县官员又是如何统计出这些丁数呢?恐怕缺少较系统的调查。即至少不如五年一次的户口编审容易操作。因为编审一般要经过以下程序,即“令人户自将本户人丁依式开写,付该管甲长;该管甲长将本户并十户造坊、厢、里各长;坊、厢、里各长将甲长所造文册攒送本州县;该州县官将册比照先次原册,攒造类册,用印解送本府;该府依定式别造总册一本,书名、画字,用印申解本省布政使司”<sup>①</sup>。这表明编审户口至少在形式上有健全的组织保证。清政府可能也意识到这种与编审相脱离的年度人丁统计会有其随意性,故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下令:“直省编审人丁,俱以一年为限,岁终造册具题”<sup>②</sup>。实际上这并不是将五年编审一次改为一年一次,因为此后的五年编审活动仍然有,直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才明令取消。我们认为,这样做是为了让地方官上报的数字准确一些,即让年度人丁统计借助编审所具有的组织系统来进行,从具体的入户调查开始。当然这种年度编审会使人丁数字变动与丁银增加更有效而及时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当年增加的人丁就要承担丁银,而不是过去五年编审后再作调整。但这种办法同样无法避免百姓瞒报、漏报人丁的问题。

清代人丁数字的不准确除了民众方面的原因外,还有官府本身的原因。清初中央曾规定:“州县官增丁至二千名以上,各予纪录”<sup>③</sup>。这种政策当然可以激励一些地方官审丁查丁的热情。但另一方面,增丁将伴随着一州一县赋税量的增加,从而使地方官府的工作难度提高。所以,不少地方官对此也采取敷衍态度。康熙帝在五十二年(1712年)时指出:“朕览各省督抚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sup>④</sup>。未“尽行开报”实际是丁口漏报的代名词。

### 2.3 18世纪初期人丁数量的校正问题

清初人丁的漏报在《清实录》年终统计数字中反映得明明白白。从实录上看,清代人丁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达到20 340 655丁。而这一年正是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第三年,收复台湾第二年。自此之后,清王朝广大内地在一个较长时期没有发生较大规模战乱,处于和平发展之中,为人口增长创造了条件。而人丁是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也会有相应增加。可从实录上看,清朝人丁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几乎没有增长,该年人丁数20 312 560。即这23年中,人丁净增仅71 905丁,年均增长0.15%。这与当时社会实际环境所应带来的人丁增长完全不相符合,显然是漏报造成的。而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人丁数则陡升至21 621 324丁,净增1 208 764丁,增长率达59.22%;二年以后,1710年达到23 312 236,净增1 390 912,增长率为63.45%;而1711年为24 621 314,较1710年增加1 309 088,增长率为56.19%。这三年人丁的高增长率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讲,均非人丁自然增长所能达到的水平。那么,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认为,这三年的人丁数实际是对过去二十余年人丁漏报的补偿。可见,如果我们以实录所载这些丁数来寻找它与口数的关系是不合适的。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想对这期间的人丁数字作一校正。这里将1711年的人丁数作为1684~1711年27年间的峰值人丁。那么从1684年的20 340 655丁增加到1711年的24 621 324丁,

①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133,户部。

②③ 《康熙大清会典》卷23,户部。

④ 《清圣祖实录》卷249。

净增 4 280 669 丁, 年均增长率为 7.37%。然后, 以此比率来校正 1700 ~ 1710 年间的人丁数 (见表 1)。

表 1 1700 ~ 1711 年人丁数据调整

年代	原人丁数	调整数	年代	原人丁数	调整数
1700	20 410 963	22 732 959	1706	20 412 560	23 757 322
1701	20 411 380	22 900 566	1707	20 412 560	23 932 482
1702	20 411 163	23 069 409	1708	21 621 324	24 108 933
1703	20 411 480	23 239 497	1709	21 921 324	24 287 996
1704	20 412 380	23 410 839	1710	23 312 236	24 467 068
1705	20 412 560	23 583 444	1711	24 621 324	—

资料来源: 本表“原人丁数”来自《清实录》各年年终数字。

需要指出, 虽然清政府在 1708、1710 和 1711 年因查出漏丁而使该年全国人丁数大增,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漏报人丁均已被官方掌握。实际上漏报人丁仍大量存在。可以说, 校正官府人丁数所存在的明显漏报只是我们所要做的第一步工作, 而要弄清比较符合实际的人丁数还要作更深入的分析。

### 3. 关于丁与户、丁与口的比例关系问题

从上面分析可知, 18 世纪前期的人丁数字只包括 16 ~ 59 岁之间的男子。就连会典中部分省份所包括的女口, 在收入《实录》时也要予以摒除。那么, 这些人丁数字与当时的家庭户有没有关系, 更进一步讲, 能否将丁数折算成相应比例的全体人口数? 对此, 我们想作一探讨。

#### 3.1 丁与户的关系

严格说来, 清政府在人丁统计阶段并没有要求地方编审户口时进行户的统计。因而我们从实录和会典中 (雍正以前) 都没见到全国, 甚至省一级的户数资料。

然而在一些地方志中, 我们见到个别州县有户与丁两组数字 (不过, 大部分方志没有这种户丁齐全的数字, 仅有丁数一项)。那么, 这些户数是怎么来的呢? 其统计根据是什么? 我们认为, 它们很可能是丁数统计的副产品。按照人丁编审程序, “每遇造册时, 令人户自将本户人丁依式开写, 付该管甲长, 该管甲长将本户并十户造册送坊、厢、里各长……”<sup>①</sup>。这就是说, 在编审工作的原始记录上, 丁是附着于户名之下的。并且至少在县一级汇总时, 当地的户数是能够显示出来的。在我们看来, 这是州县单位户数记载的主要来源。如果一个地区方志的编撰者比较认真, 这些户数则会被编录进去, 从而将明代以来户数统计的传统继承下来。不过, 中央政府关心更多的是丁数, 故在全国性文献中对户数不予反映。

地方志所载丁数与户数有什么关系呢? 就我所见, 基本上有 3 种情况。

(1) 户数与丁数完全一致。这种情况四川省比较普遍, 其他省也有一些。如《四川通志》曾对乾隆元年的户口编审有统计 (见表 2)。

表 2 中的资料虽为乾隆元年 (1736 年) 所统计, 但它基本可以反映雍正年间的人丁状况。此外, 四川州县方志对此记载较多。什邡县, 雍正七年 (1729 年) 编审, 主户 5 568 户, 丁 5 568 丁; 佃户 143, 丁 143, 共计 5 711 户, 5 711 丁<sup>②</sup>。江油县, 雍正八年 (1730 年), 户 1 988, 丁

①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 133, 户部。

② 嘉庆《什邡县志》卷 7。

表2 四川户丁编审统计

地区	户	丁
松茂道	106 610	106 610
川东道	159 399	159 399
永宁道	89 305	89 305
建昌道	124 529	124 529
川壮道	132 357	132 357
共 计	612 200	612 200

资料来源:《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

1988<sup>①</sup>。新繁县,户3 387,丁3 387<sup>②</sup>。浙江省嵊县,明代编审方法是“合众口为户”,而清代则“以丁抵户,是一万八千四口丁,实则一万八千四户。”<sup>③</sup>

(2) 户丁数基本一致。这种情况在全国占有一定比例,一般特征是,丁数较户数多一些。如江西省瑞昌县,顺治十三年(1656年),户3 640,丁3 722,户丁相差82,户丁比1:1.02。康熙十二年(1673年),该县户3 841,丁4 024<sup>④</sup>,相差384,户丁比为1:1.05。浙江省乌程县,康熙六十年(1721年),辖区内6个区共17 907户,人丁19 216人,相差1 309,户丁比为1:1.07<sup>⑤</sup>。山西省临晋县:“其堪应夫家之征者不过一万数千户”,“国朝(指清朝)永不加丁,临之额丁13 543”,“盖依然古者家出一人之法”。<sup>⑥</sup>

(3) 户丁数有一定差距,但差距不是很大,即一般在25%以内。浙江省余杭县,康熙二十年(1681年),户21 614,丁25 763<sup>⑦</sup>,相差4 149,户丁比为1:1.19。山东省长清县,康熙十一年(1672年),户16 514,丁18 721<sup>⑧</sup>,相差2 207,户丁比为1:1.13。

然而在大部分方志上没有户的记录,只有丁数一项。这就使我们无法更全面地观察当时的户丁关系。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即在当时社会,一部分地区的丁与户是一致的,而在大部分地区,丁数与户数虽有差距,却不是太大。一户一丁实际意味着百姓承担赋税量的减轻,而一户多丁则会增加其赋税负担。因而百姓会设法少报户中丁数,或者使其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与户数相接近。当然这种接近并不意味着一户只出一丁,一些妇孺之家由于没有成丁则可能不被统计在内,而有的户则可能有两丁。不过,总的来说,出于对自己利益的保护,若没有官府严密盘查,人丁上报会与户数趋于一致的。而那些户丁完全一致的地区则说明官府为了减少麻烦,默认了一户只报一丁的事实。因此,我们认为,对十八世纪初期的户丁关系既不能视其完全一致,又不能认为差距很大,只能说其比例关系是比较接近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户丁数字的一致或比较接近就意味着存在大量成丁漏报的现象。因为从普遍的意义来讲,平均一个家庭不可能只有一个成丁。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丁口关系中再作分析。

### 3.2 户口比问题

在18世纪初期,一个家庭户中有几口人?这个问题不易回答,因为在这个重视人丁编审的时代,政府对成丁以外的人口不感兴趣。所以中央汇总数字中没有口数。同时省一级也无全体人口数字。

① 光绪《江油县志》卷9。

② 乾隆《新繁县志》卷3。

③ 乾隆《嵊县志》卷4。

④ 雍正《瑞昌县志》卷2,户口。

⑤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浙江湖州乌程县人丁册》,全宗2类。

⑥ 乾隆《临晋县志》上篇卷1。

⑦ 嘉庆《余杭县志》卷13,户口。

⑧ 道光《长清县志》卷5。

同户数一样，在个别州县方志上有一些“男女大小口”的记载，或者直接标明“口数”。我们说，户数是一小部分地区编审人丁时的副产品，而这些口数又是如何得到的？我们认为，很可能这些地区沿袭了明末的人口统计习惯，在编审人丁时顺便对其它人口作了调查。在上报时只将人丁单独呈送，其它则作为地方资料，修志时加以利用。遗憾的是，如果结合户数对这些口数进行分析，其准确度便很值得怀疑。当然问题也可能在户数上。但无论怎样，我们不能从中得出比较合乎实际的户均规模或家庭规模。如湖北省咸宁县，顺治五年（1648年），户2 320，口42 300<sup>①</sup>，户均人口18.39。陕西省三水县，康熙八年（1669年），户1 842，口31 382<sup>②</sup>，户均人口17.04。陕西省清涧县，顺治十八年（1661年）户242，口2 877<sup>③</sup>，户均人口11.89。这么高的户均规模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清初社会是难于达到的。

而在乾隆年以后，特别是从乾隆五年（1740年）开始，清政府实行在保甲体系基础上的人口统计制度。即把人丁统计改为面向全体人口的统计。自此以后，户口资料逐渐健全起来。虽然乾隆时代起于18世纪中期，然而却相距甚近。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时期的户口资料也能反映18世纪初期的户口关系。

乾隆十四年（1749年），清代有了最早的户口齐全的全局性数据。该年户数为36 261 631，口数为177 495 039，户均人口为4.89。而省级户口资料更是大量出现（见表3）。

表3 乾隆十六年(1751年)部分省份户均人口

省份	户数	口数	户均(人)
直隶	3 036 626	14 020 848	4.62
河南	3 008 248	13 141 001	4.37
云南	368 632	1 974 031	5.35
贵州	615 298	3 166 662	5.15
广西	941 043	3 733 443	3.97
湖北	1 747 639	7 714 351	4.41
湖南	1 664 721	8 695 912	5.22
平均	—	—	4.73

资料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

从这两组数字可见，18世纪初期和中期，清代的户均规模基本上在4.7～4.8人之间。

### 3.3 丁口比问题

前面我们已经考察了丁与户，户与口的关系。虽然在官方史志上所载数字表现出丁与户一致或接近的情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丁与户在实际生活中具有这种趋同性。如果将丁数漏报因素考虑在内，丁与户是根本不会相同或者一致的。既然丁与户不等，所以也就不能将其与一个具体比例的口数相乘。

那么，有没有办法算出符合实际的丁口比呢？这里，我们尝试用18世纪中期官方资料中所提供的大丁、小丁、大口、小口这种分项数据来作一分析。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出的那样，18世纪中期，清政府改变了户口统计方式。一些省份在对全部人口进行统计的同时，还作了分项调查。即男大口（或称大丁），男小口（或称小丁），女大口和女小口共4项。这为我们了解当时的丁口比提供了方便。在这4类人中，我们只要确定哪一类代表成丁，就可比较容易地求出丁口比。因此我们把着眼点放在大丁和小丁上。

按照清前期的编审制度，成丁与非成丁的下限为16岁，即16岁以上为成丁，16岁以下为未成丁。这里有一个麻烦就是，上述大丁有无上限，即它是否象成丁标准那样，限制在59

① 光绪《咸宁县志》卷4，食货。

② 乾隆《三水县志》卷6，户口。

③ 道光《清涧县志》卷4，户口。

岁。要弄清这一点必须首先明晰这种分类统计的目的。我们认为，它是服务各地方的救济要求的。清代中央和地方在发放灾民救济粮款时是按大小口分档次进行的。而这一做法又直接继承于明代。明太祖时的灾年散粮规定为：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岁以下不与<sup>①</sup>。而明成祖时的规定更具体。“大口一斗，6~14岁6升，5岁以下不与”。可见，在这一政策中，大小口之间是有界限的。而大口中实际上也包括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具体到清代也是如此，大丁或男大口中有老丁或老年人口。因此就需要从中去除他们，才能得到成丁人数。

在清代，老年人口，特别是男性老年人口占全体男性人口的比例为多少呢？这种数据在当时很难得到。不过，民国年间这方面的数据具有借鉴意义。1931年，江苏省60岁以上男性老年人口占男性总数的5.98%<sup>②</sup>。1946年，湖北省60岁以上男性老年人口占男性总数的8.53%<sup>③</sup>。1947年，甘肃省60岁以上男性人口占男性总数的7.48%<sup>④</sup>。此外一些学者在二三十年的实地调查中发现，当时中国乡村人口60岁以上者（不分性别）占调查人数的6.01%<sup>⑤</sup>。民国时期社会环境虽较清代有一定发展和改善，但当时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小农经济占主导的经济模式没有很大改变。清代虽然落后，而当时人口的增长率却高于民国。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认为，将当时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男性人口的比例选择为6.5%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下面我们列表对此作具体说明（见表4）。

表4 部分省份人口结构数据

省份	年代	总人口数	男大口	男小口	女大口	女小口
直隶	1755	14 163 380	5 028 226	2 597 196	4 307 954	2 230 004
陕西	1755	6 873 807	2 581 698	1 302 607	1 991 816	997 686
云南	1755	2 000 772	601 462	408 680	594 235	396 415
山东	1755	24 520 364	7 693 204	5 181 834	7 039 884	4 606 342
广西	1753	3 767 216	1 452 595	523 024	1 333 895	457 702

资料来源：《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十三辑；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

将表4男大口与男小口合计即为男性人口总数。然后再乘6.5%便得出老年人丁数。从男大口中减去此老年人丁数，即可知成年人丁数。最后将老年人丁数、男小口、女大口和女小口4项相加，即为成丁之外的全部口数。下面我们再把这一计算过程列成表（见表5）。

表5 部分省份人丁比

省份	男性人口总数	老年人丁数	成丁数	成丁以外口数	丁口比
直隶	7 625 422	495 652	4 532 574	9 630 806	1:2.12
陕西	3 884 309	252 480	2 329 218	4 544 589	1:1.95
云南	1 010 142	65 659	535 803	1 464 989	1:2.73
山东	12 875 038	836 877	6 856 327	17 664 937	1:2.58
广西	5 219 811	339 288	1 113 307	2 653 909	1:2.38
平均		—	—	—	1:2.35

① 《续文献通考》卷32，国用3。

② 江苏民政厅统计，民国24年《申报年鉴》。

③ 湖北民政厅编：《湖北人口——民国35年冬季户口总复查实施纪要》。

④ 甘肃民政厅编：《甘肃省查记户口组训民众工作报告》，民国37年。

⑤ 转见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第1370页。

鉴于其它省份没有这样细的人口结构分类,所以只选择了上面五省。从地区分布来看,它们也有一定代表性,即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均有代表省份。因而,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时全国的状况。同时,这些数据虽为18世纪中期的统计,由于其距初期较近,所以将其作为对初期人口结构的反映资料也不会有很大出入。

由表5可知,18世纪初期和中期的清代的丁口比平均为1:2.35。我们认为,掌握了丁口比,就为进一步分析18世纪初期全社会普遍存在的漏报成丁状况打下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借此我们有可能计算出18世纪初期清代的人口数量。

#### 4. 18世纪初期人丁数量与人口数量的基本估计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18世纪初期丁与户、户与口和丁与口3种基本关系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这就为我们考察该时期人丁数量和人口数量创造了条件。

##### 4.1 人丁数量

我们知道,载入《清实录》的18世纪初期各年代人丁数存在着严重的漏报问题,同时我们对部分年代明显的漏报作了校正。如1700年原载人丁数为20 410 963,经过校正改为22 732 959。但这不意味着已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

通过对丁与户的探讨,我们得出这样的认识,在丁赋结合的时代,百姓总是尽可能少报人丁,不少地区下降到一户只报一丁的水平。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地区丁与户的水平是接近的。而在户与口的分析中,我们认为,在18世纪初期,全国户均人口为4.7~4.8之间。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视丁与户的比基本在1:1水平上的话,那么,丁与口的比例则在1:3.7~3.8的水平上。

然而,我们在丁与口关系的实际考察中发现,当时丁与口的比例关系为1:2.35。如果将这种比的关系转化成户口关系,即一丁为一户,这时的户口比为1:3.35。它显然低于4.7~4.8的平均水平。而要达到这个水平,就需对1:2.35的丁口比进行调整。即采用同比例扩大的方法。经过比较,这个比例调整为1.43:3.36才能达到户均规模4.7~4.8的水平。1.43:3.36的丁口比例意味着当时平均每户应有1.43个成丁,而非一个成丁。这就是说,为了少承担丁银,当时全国有约43%的成丁漏报率。

按照这个漏报率,1700年的成丁数应为 $22\,732\,959 + 22\,732\,959 \times 43\% = 32\,508\,131$ 。

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在成丁编审时代,清政府虽力图编审全部成丁,然而官府,特别是中央一级汇总成丁数时只将当差人丁计入。有一部分人丁,主要是绅衿则不被计入。如直隶康熙十九年(1680年)总计人丁3 223 880丁,“内除优免人丁22 066丁免征外,实在人丁3 201 814丁”<sup>①</sup>。雍正四年(1726年),山西人丁共1 592 608丁,“内除绅衿优免本身36 041丁外,实行差人1 556 567丁”<sup>②</sup>。那么,全国共有多少人被优免呢?我们认为,如能对当时的生员数有所掌握,就可对绅衿总数有一定了解。根据笔者统计,在清代中期,生员约为513 774人<sup>③</sup>。将优免生员加入1700年的成丁数内,该年人丁总数为 $33\,021\,905$ 。以此类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人丁数为: $25\,305\,178(\text{原报丁数}) + 25\,305\,178 \times 43\% + 513\,774 = 36\,700\,179$ 丁。雍正十二年(1733年)人丁数为 $26\,417\,932(\text{原报丁数}) +$

① 光绪《畿辅通志》卷96,财政略,户口。

②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部典册,山西盛世滋生户口黄册。

③ 王跃生:《清代生监的人数计量及其社会构成》,载《南开学报》,1989年1期。



$26\ 417\ 932 \times 43\% + 513\ 774 = 3\ 829\ 417$  丁。

#### 4.2 人口数量

根据前面分析, 当时的丁口比为 1:2.35, 我们设口数为  $x$ , 并且已经知道各相应年度的实际人丁数。那么, 可列出 1700 年的丁口关系比例式:  $1:2.35=33\ 021\ 905:x$ ,  $x=2.35 \times 33\ 021\ 905=77\ 601\ 477$ 。这是该年成丁以外的全部口数。1700 年的全部人口数应为人丁数 + 口数, 即  $33\ 068\ 041+77\ 601\ 477=110\ 669\ 518$  人。

同理, 1722 年的丁口关系比例式为:  $1:2.35=36\ 700\ 179:x$ ,  $x=36\ 700\ 179 \times 2.35=86\ 245\ 421$ , 该年人口总数  $=36\ 700\ 179+86\ 245\ 421=122\ 945\ 600$  人。

1733 年的比例式为  $1:2.35=3\ 829\ 147:x$ ,  $x=3\ 829\ 147 \times 2.35=89\ 984\ 829$ , 该年人口总数  $=3\ 829\ 147+89\ 984\ 829=128\ 276\ 247$ 。

### 5. 结 语

18 世纪初期清代丁口数量与人口数量问题是比较复杂的。而其根源在于统计口径不一和数字的准确度不高。所以我们尝试从丁口的实际关系这一角度作为突破口, 并在此基础上估算当时的人丁数量和人口数量。但是, 我们却不敢说这种估算是完全接近实际的。然而我们认为, 这种尝试是必要的, 较之以往那些人丁关系的简单折算, 它或许是一种有益探索。

(本文责任编辑: 徐培英)

---

(上接第 16 页)

计算病伤残率可以有两种方法: 一是调查人群中病伤残情况的人数除以总调查人数得到的率; 二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调查人群中病伤残情况的累积时间除以总调查人数在该时间范围内的总累积时间得到的率。前者是以事件(如患病、活动受限、残疾或住院等)发生的频数为单位来计算, 而后者则以事件发生持续的时间为单位来计算。本次研究所用的家庭健康询问调查资料中关于患病、活动受限和住院情况包含了与时间有关的病伤残信息(患病持续天数、活动受限周数和住院天数), 健康预期寿命指标的计算是建立在寿命表的基础上, 考虑到寿命表中生存人年数是个包含时间的度量单位, 故采用第二种方法来计算病伤率和活动受限率。由于研究资料中关于残疾的调查内容, 只有调查人群中存在残疾状态的人数, 所以只能用第一种方法来计算残疾率。

#### 参 考 文 献

王海军等. 健康测量指标的演变与发展. 中国社会医学, 1994 (4) 20-23

卫生部. 国家卫生服务研究: 1993 年国家卫生服务总调查分析报告. 1994.11

Robine JM, et al. Healthy life expectancy: evaluation of global indicator of change in population health. BMJ 1991; 302: 457-460

Davies M. Epidemiology and the challenge of ag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985; 1: 9-21

Sullivan DF. A single index of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HSMHA Health Reports 1971; 86: 347-354B

Katz S, et al. Active life expectancy.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83; 309: 1218-1224

(本文责任编辑: 朱 犁)